

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演变

张光宇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是个执政党,它经历了由资产阶级政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最后堕落为地主买办阶级的政党的演变过程,它的演变对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拟对其演变的过程和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基本上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还决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名义下,将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在51名中执监委中有共产党人10名。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开始由资产阶级政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在改组国民党方面虽是迈开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改组工作并未完成。随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中进行了一系列改组工作,这种改组的深远意义是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各级党部中占了优势,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根据《中国国民党章程》的规定,国民党“一大”闭幕之后的次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并决定设立“一处”(秘书处)“八部”(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军事、调查等部)组成中央党部^①,其中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都是共产党人^②。工人部长廖仲恺、妇女部长曾醒是国民党左派。在中央党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优势。

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各地的党务,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和四川建立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作为中央党部的派出机构,由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前往组织^③。上海执行部成立于1924年2月25日,管辖长江下游各省,设立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等部。虽然各部部长不是共产党人,而组织、宣传、工人农民三部的秘书毛泽东、恽代英、邵力子以及干事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王荷波、向警予都是共产党人,在执行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④。台湾史学家也承认“共产分子渗入了上海执行部”^⑤。北京执行部成立于1924年4月20日,管辖黄河流域各省,设立秘书处和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工人、农民、调查等部^⑥。其中组织部长李大钊、青年部长于树德、妇女

部长褚松雪都是共产党人。调查部长王法勤系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宣传部长马叙伦也与李大钊接近。在五个执行部中，以北京执行部的共产党力量最大，台湾史学家也承认“共产党掌握了北京执行部”^⑦。汉口执行部成立于1924年4月，管辖湖北、湖南、贵州等省。汉口执行部系由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林祖涵（共产党人）组织的，设立秘书处和组织、宣传调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部，其中秘书处秘书于若愚、组织部长林祖涵、干事李立三、许白昊、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干事项德隆、青年部干事林育南、妇女部干事夏之栩均系共产党人。国民党右派、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青年部长兼妇女部长覃振未到任，实由秘书和干事主持工作^⑧，所以汉口执行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主持的。哈尔滨和四川两个执行部虽已内定名单，却始终未能成立。在五个执行部中，以北京执行部存在的时间最长，成绩最为显著。后来，由于各省党部逐渐建立起来，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便决议取消各地执行部^⑨。

在中央党部和各地执行部的指导下，各地的省党部也先后建立起来了。各省党部多由共产党人帮助建立和主持工作。毛泽东曾说过：“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⑩。周恩来也说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⑪。事实正是如此。1924年2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各省党务进行计划决议案》，决定派遣筹备员，分赴各省建立临时省党部，其中直隶的于方舟，山西的韩麟书，热河的韩麟符，湖南的夏曦，湖北的刘伯垂，江苏的张曙时，浙江的沈定一，江西的赵醒侖、邓鹤鸣等人均系共产党人^⑫。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于1924年4月1日，委员有夏曦、何叔衡、李维汉、邱维震、李达、郭亮、罗宗翰、夏明翰、李六如等均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5年5月成立正式省党部，在13名执监委员中除三名国民党左派外均系共产党人。湖北临时省党部成立于1924年4月，大多数委员是共产党人，“同志殊占大半，计委员（董）必武、（刘）昌群、（刘）光国、许鸿、（张）继渠等，秘书有何恐，干事有（余）世颂”^⑬。1925年7月成立正式省党部，在22名执监委员中，共产党人占15名，董必武当选为正式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实际上主持省党部日常工作。江西临时省党部成立于1924年3月，委员有赵醒侖、邓鹤鸣、涂振农、曾天宇、邹努、王镇寰、姜伯彰等人，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占居优势。1925年7月成立正式省党部，在16名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12人。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前的统计，已正式成立省党部的有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直隶、河南、察哈尔、内蒙、绥远、热河等省，正在筹备省党部的有广西、福建、奉天、浙江、吉林、四川、甘肃、安徽等省，已成立特别市党部的有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等市。共发展党员20万^⑭。国民党的组织“渐渐及于全国了”^⑮。在党员中，在地方组织中，左派力量占居优势。据中央党部组织部长谭平山说：“根据今年（1926年）5月国民党全会所发表的材料，党员数目为三十一万六千人，而按党组织部的精确统计，只有二十五万人，如果不算七万国民党的士兵党员，那么左翼和共产主义派就有十五万人，而中间派、右翼和极右翼总共不超过三万人”。“十分之九的地方组织处于共产主义派和左翼的领导之下”^⑯。国民党员的阶级成份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当时广东的党员中，最多的是农民，约占40%，其次是工人和学生，各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警、法、政、报、自由职业和其他人员共占百分之几^⑰。

以上事实表明，在经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的一系列改组工作之后，国民党才基本上成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二)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日益起着民主革命联盟作用的国民党却不断发生分化，最后堕落为地主买办阶级的政党。

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发生了四次大的分化。

第一次是冯自由派的出现。从孙中山的酝酿改组国民党的时候起，国民党右派就反对改组，最先跳出来的是买办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冯自由、马素等人。冯自由曾是老同盟会员，但因竭力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一大”上没有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他反对改组的“理由”是共产党人跨党（两重党籍），以所谓跨党问题为借口，企图迫使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国民党“一大”后，他和邓泽如等人在广州另行开会，起草一项决议，“警告”共产党员企图控制党权。国民党内发生了意见分歧怎么办？孙中山说，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谁反对改组，谁可以退出国民党，另一条是如果国民党人都反对，我就宣布解散国民党。自然，孙中山并没有解散他首创的国民党，也没有让冯自由简单地退出，而是把他开除出党。

反对国民党改组是当时的一股反动逆流，不仅是冯自由等人。1923年11月29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广东支部长邓泽如纠合林直勉等11人，向孙中山递交了所谓《检举共产党文》，反对改组国民党，大肆攻击共产党。孙中山于12月3日对此文逐段加以批驳，批示：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切不可疑神疑鬼”。1924年6月中旬，邓泽如又与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向孙中山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反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说什么“绝对不宜党中有党”。6月25日，国民党训练员鲍罗廷对张继、谢持的争辩中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8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提出的《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与《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项议案，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与第三国际联络，“协商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络方法”，“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这虽对共产党员的活动是个限制，但邓泽如等人妄图取消党团组织的阴谋却未能得逞。

第二次是西山会议派的出现。1925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老右派谢持、林森、邹鲁、张继等10余人在北京西山开会，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们决议：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即日停止职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苏联顾问，“开除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等，并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次年3月他们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裂。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1925年12月，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次年1月国民党“二大”又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

第三次是蒋介石集团的叛变。早在1925年7、8月间，国民党新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就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宣扬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反动思想，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戴季陶主义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共篡权的理论根据。在北伐战争过程中，蒋介石的新军阀主义日益发展，反共暴行不断发生，

最后发展到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公开叛变革命。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导致了国民党的公开分裂，使大革命遭到局部失败。

第四次是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夏斗寅叛变、许克祥叛变接踵而至，汪精卫集团也由革命转向动摇。郑州会议之后，又由动摇转向反动，最后发展到召开“七·一五”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导致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变质，使大革命遭到最后失败。

促使国民党演变的决定力量是国民党内的当权者，国民党演变的主要标志是国民党中央左右派力量的对比变化。与国民党四次大分化基本相吻合，国民党中央左右派力量的对比变化也经历了四个阶段：

1. 左派占优势的阶段(国民党“一大”至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首先，从国民党“一大”后中央党部的情况看，如前所述，秘书处三名成员中，有共产党人一名，国民党左派一名。组织、工人、农民三部完全在共产党人掌握之下。而组织部的地位又居于各部之首，主管全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党员的吸收和训练，各地党员干部的派遣。国民党右派邹鲁也承认说：“组织部是党中最重要机关，由共产党的谭平山主持，本党一切的组织章程，由他拟订；各地组织方面的人员，由他委派；而各地党务的筹备员，有共产党的就派，没有共产党的竟不派；并且派出去的人员，祇收容共产党和接近共产党的人”^⑩。

其次，从国民党“一大”后历届中央全会看，1924年8月15日至31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主要是肯定了国民党“一大”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者，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此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⑪。1925年5月18日至25日，国民党又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再次肯定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指出：“本党为使国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绝任何派别之革命主义者加入。从前中国革命同盟会时代，即系如此”^⑫。这两次全会，否认了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坚持了联共的政策，表明左派的主张占了上风。

第三，从国民党“二大”新选出的中央党部的情况看，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名，中央监察委员12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名，共计80名。由于陈独秀、张国涛的妥协退让，共产党人只有25名，约占25%。但是，在中央党部的成员中，左派力量却占了优势。秘书处的全部成员，即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刘芬，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代理宣传部部长毛泽东、秘书沈雁冰，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罗绮园，外事部秘书许苏魂，商人部秘书黄乐裕，妇女部秘书邓颖超均系共产党人，在中央党部21个职务中，共产党人占16个，约占76%。外事部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均系国民党左派。

2. 右派占优势的阶段(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至武汉临时联席会议)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主要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限制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根据决议案中“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的规定，蒋介石代替谭平山当上了组织部长(由其秘书陈果夫代理，随后不久，陈正式出任组织部长)；顾孟余代替毛泽东任宣传部长，甘乃光代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

叶楚傖代替刘芬任秘书处书记，中央党部已无共产党人了。同时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推举张静江(右派)任之(7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中央临时全体会议，推举蒋介石继任)。从而，使国民党右派篡夺了中央党部的领导权，中央党部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占优势的局面。“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②。

3. 国民党中央逐渐分裂的阶段(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至“四·一二”)

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上。12月7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停止办公。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12月12日召开谈话会，决定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

同年11月3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后，蒋介石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这里。他为了控制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挟天子以令诸侯”，于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并提出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挑起了“迁都之争”，标志着国民党中央公开分裂的开始。

此后，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武汉和南昌两个左右派势力中心的局面。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坚持国民党中央在广州作出的迁都武汉的原议，坚持临时联席会议继续行使最高职权，坚持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展了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的“党权运动”。由于迁都武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部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冲破蒋介石的阻挠来到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3月10日至17日在武汉举行。全会提高了党权，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但没有撤销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仍选他为中央常务委员。蒋介石便利用总司令要职，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说，接连制造“赣州惨案”、“南浔惨案”、“安庆惨案”，直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

4. 武汉国民党中央由革命转向反动的阶段(“四·一二”至“七·一五”)

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四·一二”之前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还表现出了相当的革命性，但“四·一二”之后，面临帝国主义和旧军阀的四面包围的严重形势，开始由动摇转向反动了。他们反对东征讨蒋，包庇叛乱军官，破坏三大政策，直至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三)

国民党逐渐演变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第一、国民党的阶级成份是复杂的。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国民党中一部分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仍留在党内。从阶级成份上看，国民党不仅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还包括了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虽然前一部分在数量上占了多数，是党内的基本群众，后一部分人数较少，但有的却是国民党的元老，身居党内要职，在党内影响很大。党内不同成份的人们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态度也就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左、中、右三派的政治分野。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三民主义者是左派势力，代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中派代表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右派之中，又有新、老右派之分，老右派多是国民党的元老，新右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代表，

如戴季陶和蒋介石等人。新老右派必然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化和三大政策。这就是国民党演变的阶级根源，也是主要的原因。

此外，作为国民党的政治原则或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的新三民主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虽基本相同，但还有不同的部分，即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宇宙观的不同。这些缺陷也被国民党右派所利用，作为反共分裂活动的借口。

第二、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右派要公开反对三大政策，在组织上与革命的国民党分裂，还得寻找对他们有利的时机。西山会议派的成员虽从国民党酝酿改组之日起就反对国共合作，但由于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还在世，他们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不敢公开与革命的国民党分裂。当孙中山逝世之后，他们以为时机已到，便公开掀起反共的旗帜，另立伪中央，与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蒋介石集团在羽毛未丰的时候，他们还要打着拥护三大政策的旗号，迎合革命的潮流，来扩充自己的右派势力。当在北伐战争中，他们的右派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之后，以为羽毛已丰了，反共的时机成熟了，便公开举起屠刀，向革命人民杀过来。汪精卫集团长期以左派面目出现，也曾表现出相当的革命性，但当着1927年上半年工农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他们感到工农运动危及了自己的利益，当着“四·一二”之后革命遭到局部失败的时候，他们害怕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威胁，便转而反对三大政策，由动摇转向反动了。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的老右派和新右派一批又一批地从国民党内分化出去。

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新右派的退让政策。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老右派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主要失误是对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假左派的政策。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把蒋介石看作中派，虽然有时也说他是新右派，但又认为他与老右派不同，实际上并不认为他是新右派。从“三·二〇”反共事件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蒋介石虽然也有过一些斗争，但基本上是实行退让政策。通过“三·二〇”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使蒋介石篡夺了党、政、军大权。在北伐战争中，一直把蒋介石看成是不能不依靠的军事领袖。当国民党内的“迎汪复职”运动起来之后，当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之后，他们还一直坚持“汪、蒋分权”（汪任党和政府领袖，蒋任军事领袖）的错误主张。因此，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汪精卫的认识和政策更是错误的。在大革命时期，一直把汪精卫看作左派领袖，甚至在大革命后期，当汪精卫的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日益暴露的时候，仍然实行以拉拢汪精卫为中心的错误政策。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当时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③。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未能识破汪的假左派面目，错误的依靠了他，从而客观上助长了他反共的气焰。

第四、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还有国际背景。在北伐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形势下，帝国主义除了以武力进攻中国革命外，还采取了分化革命阵营的办法。1926年末，英帝国主义宣布了所谓对华新政策，表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对国民革命则持“体贴与谅解”的态度，虚伪地承认中国应有“关税自主权”。美帝国主义比英帝国主义更着重于分化政策，1927年1月26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布美国准备“以最宽大的精神”与中国谈判新约，企图以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上的虚伪让步来引诱中国资产阶级。日本帝国主义对分化中国革命阵营最为积极，1927年1月28日，日本外相币原在议会中正式发表

对华政策演说，向国民政府虚伪地表示友好态度，对中国的内政采取“绝对不干涉主义”。因此，蒋介石于1926年11月21日在南昌向外国记者公开发表谈话，对美国表示友谊，要求美国给予援助。蒋介石还于1927年2月初，派戴季陶去日本活动，和日本的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条约局长等会谈，要求日本支持他。蒋介石到上海策划反革命政变，便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于3月26日到达上海后，日本外相币原即训令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要抢先同他建立联系。3月30日，矢田会见蒋介石时指出，“你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加以特别深切的考虑”，蒋当即表示，“充分谅解尊意，定当严加取缔”。帝国主义的分化政策，加速了蒋介石集团的叛变。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演变的历史告诉人们，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国民党的不断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如果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始终掌握着国民党的领导权，对右派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决不会导致整个国民党的蜕化变质，决不会导致大革命那样惨痛的失败。

注释：

① 据《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改组史料》一文记载：1924年2月20日，国民党中央“第七次常会……因事实上之需要，曾次第添设三个部：一、海外部，林森长之；二、实业部，汪精卫长之；三、商人部，伍朝枢长之，然不久，商人、实业、调查三部撤销，仍维持当初一处八部之原状”。（载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献》第八辑）

② 《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其中的共产党员》，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5期。

③④ 谭平山：《中央党务总报告》（1926年1月），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速记录》。

④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至第四次执委会会议记录》，转引《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

⑤⑦⑧⑫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⑥ 《北京执行部报告书》（1926年1月），转引《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3期。

⑨ 《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1926年1月），载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

⑩ 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载1981年7月16日《光明日报》。

⑪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2页

⑫ 《武昌团地委的报告》（1925年）

⑬ 《政治周报》1925年12月20日第3期

⑭ “谭平山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1926年10月），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83页

⑮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1926年12月）

⑯ 邹鲁：《回顾录》、《中国国民党史稿》。

⑰ 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

⑱ 《关于确定最高原则训令全体党员》

⑲ 《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1926年9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⑳㉑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4、167页。